|  |  |  |
| --- | --- | --- |
| 浙江文艺出版社新产品资料表 | | |
| **书名：**  罗斯玛丽：肯尼迪家族隐藏的女儿  **揭晓肯尼迪家族隐藏数十年的秘密；入选《人物》杂志2015年度十大好书**  **————————————————————**  **连续十周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榜；**  **启发了身心障碍者人权、特殊教育和医疗伦理的肯尼迪家族悲剧**  **罗斯玛丽的故事即将搬上大银幕，由《爱乐之城》女主角艾玛•斯通主演**  **定价：**39.80元 | | |
| **基本信息** | | |
| 罗斯玛丽封面立体.jpg | **作者** | [美]凯特·克里福·拉森 |
| **译者** | 张琼懿 |
| **外文书名** | Rosemary:The Hidden Kennedy Daughter |
| **出版社** | 浙江文艺出版社 |
| **出版时间** | 2018.10 |
| **页数** | 251页 |
| **字数** | 205千字 |
| **印刷时间** | 2018.10 |
| **开本** | 32开 |
| **纸张** | 80克龙口纯质纸 |
| **版次** | 1-1 |
| **ISBN** | 978-7-5339-5366-9 |
| **CIP数据** | Ⅰ. ①罗… Ⅱ. ①凯… ②张… Ⅲ. ①罗斯玛丽－传  记 Ⅳ. ①K837.128.9 |
| **包装** | 平装 |
| **上架建议** | 传记>美国政治人物>肯尼迪  传记>女性人物>肯尼迪  传记>家族研究>肯尼迪  传记>历史人物>励志 |
| **关键词：** 传记 罗斯玛丽 肯尼迪 美国总统 政治人物 家族研究 励志 医学 心理 精神疾病 电影改编 | |
| **商品信息** | | |
| **内容简介**  这是美国第35任总统约翰·肯尼迪的妹妹罗斯玛丽的传记作品。  罗斯玛丽·肯尼迪患有先天智能障碍，长大后被认为有精神疾病。罗斯玛丽的双亲起先找尽资源、试验各种教育方式想“治愈”她，然而收效甚微。随着她姿色出众引来异性注意，父亲为了避免闹出丑闻，在罗斯玛丽23岁时采用了当时颇具争议、后来被全球医学界废除的“大脑额叶切除术”治疗她，反致使她重残。为保护家族的声誉，罗斯玛丽被父亲偷偷送进疗养院，从此淡出公众视野，被从家族中“抹去”。  罗斯玛丽的遭遇令兄弟姐妹深感震惊，他们投注资源研究精神疾病与智能障碍，发起世界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呼吁人们消除对智能障碍人士的偏见和歧视，从而扭转全世界在这方面的认知。 | | |
| **编辑推荐**   * **一个肯尼迪家族隐藏数十年的悲剧，一个促使特殊奥运会成立的背后动因**   肯尼迪家的大女儿罗斯玛丽从小出入名门学校，甚而晋见英国国王和王后，一时大出风头，然而，世人不知道的是罗斯玛丽患有身心障碍。这一秘密被肯尼迪家族紧紧掩藏，但数十年之后肯尼迪家族的人因为感念于罗斯玛丽的遭遇，纷纷奔走，促成了许多重大身障人权及社会正义法案的通过。   * **不为人知的一段历史，折射出二十世纪美国社会政治、经济，以及社会观念的巨大变化**   二十世纪的美国社会不仅视智能障碍为认知缺陷，甚至认为是道德瑕疵。不仅医疗资源稀缺，甚至有持“优生”观点的专家认为他们不配活着。当时的智能障碍、精神疾病患者被污名化，生存环境举步维艰，衍生出许多偏离任性的作为。   * **《爱乐之城》女主角艾玛•斯通将在大银幕上演绎“罗斯玛丽”**   2016年3月，美国编剧写好剧本《罗斯玛丽的信》，要将罗斯玛丽的故事搬上大银幕，由艾玛•斯通主演。 | | |
| **名人推荐**  通过塑造罗斯玛丽这样一个核心人物，作者向我们呈现了一份珍贵的历史记录，来讲述这个由精神疾病带来的令人扼腕的历史悲剧，以及一个显赫家族为了弥补过错而付出的迟到的努力。  ——《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  在美国总统肯尼迪（JFK）的妹妹罗斯玛丽遭受到灾难性的脑前额叶切除术致使终身瘫痪后，这本书揭示了一个显赫家族黑暗秘密中令人心碎的细节。  ——《人物》(*People*)  从未有人对罗斯玛丽这位女性进行过全面的刻画，而拉森成功地做到了。面对罗斯玛丽这个“难题”，肯尼迪家族显然不知道如何去应对，不是无视她的需求就是将她推出镁光灯外，以维持家族的体面。最终，只有尤妮斯展现了应有的同情，并以此为契机创办了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  ——《波士顿环球报》（*Boston Globe*）  令人心碎。  ——《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  拉森在刻画肯尼迪家族方面做得非常出色，从罗斯玛丽的父亲乔在政治方面有所作为，到母亲罗斯身处的孤独困境，充分地铺垫出了罗斯玛丽与父母、与兄弟姐妹之间的关系。作者呈现出了在做前额叶切除手术之前罗斯玛丽的肖像——一个充满了热情和爱的美丽的年轻女子。这让那场悲剧更加令人痛心。这本书研究详尽，好看而且发人深省。  ——《柯克斯书评》（*Kirkus Book Reviews*） | | |
| **作者简介**  凯特·克里福·拉森  Kate Clifford Larson  新罕布什尔大学美国历史学博士，专攻十九及二十世纪美国女性及非裔美国人的历史，热衷于研究和撰写美国女性的故事，发现那些被历史湮没的声音。  著有《前进应许之地：哈莉特·塔布曼：一为美国英雄的故事》《刺客的帮凶：玛丽·索拉特与刺杀林肯的阴谋》《罗斯玛丽——肯尼迪家族隐藏的女儿》。 | | |
| **目录**  第一章 生产时的意外  第二章 委曲的才女，强势的母亲  第三章 一再落后  第四章 频繁转学  第五章 短暂的避风港：蒙特梭利学校  第六章 竞争激烈的家，是她的战场  第七章 一劳永逸的方法  第八章 因为她，他们决定改变社会  后记  致谢  缩略词索引  原注 | | |
| **在线试读**  第一章 生产时的意外  （一九一八年）九月十三日星期五，肚子里怀着老三的罗斯·肯尼迪开始感觉到肚子一阵阵剧痛。家里请来负责在怀孕后期照顾她的护士，立刻通知了罗斯的产科医生弗烈德瑞克·古德（Frederick L. Good），请他尽快前来。当时肯尼迪一家人住在波士顿郊区布鲁克莱恩镇（Brookline）比尔斯（Beals）街八十三号。罗斯的前两胎——当时三岁的小约瑟夫·肯尼迪（Joseph Patrick Jr.，小名小乔）和十六个月大的约翰·肯尼迪，都是在家里出生的，罗斯打算这一胎也在家里生产。在那个疾病恐慌的年代，怀孕过程能够一切顺利，身为虔诚天主教徒的罗斯已经充满了感恩。  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一八年的战争期间，西班牙流感肆虐全球，在世界各地夺走了上千万条性命，遭受感染的人更是不计其数。一九一八年，病魔把魔爪伸入了波士顿，开始袭击波士顿居民。到了那年九月中旬，已经有五千多名波士顿居民感染了西班牙流感。有如瘟疫一般的西班牙流感，一年内侵袭了美国三次，这次是第二波。戏院、学校、会堂、教堂等公共场所都被迫关闭，政府也要大家尽量别出入公共场合，以免疫情继续扩大。波士顿和郊区的地区医院和诊所里，人满为患。过去有流感侵袭时，受威胁的通常是年幼的孩童和年长的老人，但是这一次不一样，原本身强体健的一些青年男女也难逃其害。才刚打完第一次世界大战，甫从欧洲凯旋的年轻士兵，感染了肺炎、引发呼吸衰竭，因而死亡的数以千计。一名当时在波士顿夜以继日工作的护士表示，疫情最严重时，“整座城市仿佛正迈向死亡，每户人家都有病危的人，街上到处在举办丧礼”。在短短的六个月内，有将近七千名波士顿居民病逝。  所幸，罗斯和丈夫乔（Joe）家里，没有遭受这个致死病毒波及，两个年幼的孩子都安然无恙。他们聘来的这名护士，每天都会帮罗斯和怀里的胎儿做例行检查。她会听听孩子和母亲的心跳、从产道诊察胎儿的位置、记录胎儿在子宫内活动的情形等，待医生来看诊时，再仔细向医生报告这些结果。她在发现罗斯有产兆后，立刻通知了古德医生，紧接着将罗斯的房间布置得像医院里消毒过的产房，同时吩咐女管家和用人去烧热水，并再三确认医生待会儿可能会用到的器材或仪器，都在伸手拿得到的地方。  这名护士受过最新的产科护理训练，她谨记着受训期间护理手册上的一段话： 产科护士负责照顾的人有两个：一是怀孕的母亲，一是尚未出世的孩子。“万一不幸，母亲在医生还未抵达前死去，”《产科护理》（*Obstetrical Nursing*）指导手册上这么写道，“这名护士不管对医生或是对这个家庭，都难辞其咎。”这样的训诫让照顾产妇的护士处于两难： 她受过的训练一方面教她如何接生，但另一方面又建议她等候医生来接生。  罗斯的阵痛愈来愈剧烈了，但是这名护士不能为罗斯施打麻醉，因为她既不是医生，也不是麻醉师。这种事，恐怕只能等古德医生，还有和他合作的麻醉医师爱德华·欧布莱恩医生（Edward J. OBrien）抵达时，才能进行。  只不过这一天，医生还没到，孩子就进到产道了。随着阵痛一波波加剧来袭，罗斯也按捺不住地把孩子往外推。护士要她保持镇静，希望她撑过每一次阵痛，压抑住把孩子往外推的冲动。但是孩子已经等不及了，她的头就要出来了，这在生产过程中是极为关键的阶段。当时的人已经明白，孩子在产道里待太久会缺氧，大脑可能因此受损，导致生理缺陷。  为了照顾众多流感病患，罗斯的医生迟到了。护士要罗斯夹紧双腿，阻止婴儿诞生。即使她是受过训练的产科护士，还是选择不接生这个孩子。  “我对我的产科医生充满信心，”罗斯在多年后这么写道，“我也对上帝有信心……我深信，一旦身体承受的痛苦结束，我就可以迎接喜悦了。”一旦孩子出生，就没事了，她心里这么想。然而，提供病人最好的照料，或许不是古德医生和同僚的行事原则。那个年代健康保险尚未问世，为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波士顿人提供医疗服务，可以为他们带来非常稳定而优渥的收入。如果古德医生错过接生孩子的机会，他损失的接生费与新生儿照顾费用，高达一百二十五美元。并拢双腿还是阻止不了孩子出生，于是护士采取了更加危险的手段：她用手挡住孩子的头，让婴儿继续停留在产道内，受尽了整整两个小时的折磨。  终于，医生来到肯尼迪家了，那时是晚上七点钟，他接生了罗斯这个看似健康的宝宝。肯尼迪夫妇在《波士顿环球报》（*Boston Globe*）上宣布了这名婴孩诞生的消息：“继两个健康的男孩后，家里的孩子房又添了一名秀丽的小姑娘。”祝贺的鲜花、卡片从四面八方涌来。孩子依母亲的名字取名，叫小罗斯·玛丽·肯尼迪（Little Rose Marie Kennedy）。小时候家人叫她萝西（Rosie），长大后叫她罗斯玛丽（Rosemary），她将拥有来自父母双方的疼爱与照顾。  罗斯玛丽是个“乖巧安静的孩子，她不像两个哥哥那么爱哭”。五十多年后，罗斯这么回忆道。生下罗斯玛丽后，罗斯卧床休息了几个星期，一般中产阶级或上层社会妇女产后，差不多都休息这么长的时间。当时的观念认为，刚生产完的妇女应该卧床至少九天，之后几天可以慢慢恢复日常活动，像是走路之类，然后再花几个星期，逐步适应更大的活动量，所以理想上要坐月子六个星期。罗斯很享受那段时光，因为她可以全心全意陪伴、照顾、宠爱刚出生的罗斯玛丽。至于两个男孩，则交由兼职和全职的育婴女佣或其他用人来照顾，帮他们梳洗、准备食物等等。回想起那段她和宝宝独处的时光，罗斯写道：“那段时间，能和婴孩共享片刻的宁静，对母亲和婴孩都是好事。”  当时，乔刚升任福尔河造船厂（Fore River Shipbuilding Company）的协理。这家造船厂是伯利恒钢铁（Bethlehem Steel）的子公司，因着这份工作，乔可以让他太太过上贵妇般奢侈的生活。罗斯玛丽出生时，乔三十岁，战争期间，绝大多数这年纪的男性都会被征召入伍，但是由于乔的公司正在制造欧洲战场上急需使用的海军舰艇，他底下有数千名工人，掌有数百万美元的政府合约，所以免了这项劳役。乔在工作上表现得可圈可点，不论经商还是管理方法都很有一套，除了让造船厂快速拓展、员工不断扩编，他也顾及了员工的吃、住、交通等问题。他的工作量遽增，每天工作时间颇为冗长，晚上经常没办法回家，这样的工作习惯养成后，跟了他一辈子。然而，拼命三郎般的工作态度，也让乔从此有消化道溃疡的毛病。在罗斯玛丽出生一个月后，乔就曾住院休养身体。消化道溃疡等肠道问题持续困扰着他，直到他死去。  乔和罗斯是在一九一四年结婚的。容貌与智能兼具的罗斯，是波士顿市长约翰·“甜心菲茨”·菲茨杰拉德（John “Honey Fitz” Fitzgerald）的长女，母亲玛丽·约瑟芬·“乔茜”·汉农（Mary Josephine “Josie” Hannon）则来自东波士顿当时最具政治影响力的家族。这场婚姻无疑是政治与经济的坚强结合，也因着这样的政经基础，夫妇俩很快便晋升为新兴爱尔兰社会、政治，以及经济精英社群中的翘楚。  早在十九世纪中叶，大约是两个世代前，波士顿北端开始聚集许多移民和穷苦的劳动阶级，他们的需求和追求的利益，与在美国土生土长的波士顿婆罗门（Brahmin）和扬基贵族截然不同。他们的祖先都是早在好几个世纪前就在波士顿落脚，整个新英格兰地区的文化与社会雏形都是由他们建立的。从这个地区的政治、教育、社交活动、社交关系、经济，甚至城镇的景观，都可以看出新教徒带来的影响。有权势的商业界、政治界、文学界领袖比邻而居，自成一群与众不同的新教徒贵族。  东边与北边分别以波士顿港和查尔斯河（Charles River）为界的波士顿北端，占地只有一百英亩，却是美国当时人口最稠密的地方。一八六○年，密密麻麻的巷弄中住了两万七千个居民，当中有一半以上是爱尔兰移民。几年后，逃离政治、经济和农业灾难的东欧人，以及各地受反犹太迫害的人，一波波涌进，大家都希望在这里找到新愿景。在这里，廉价公寓和血汗工厂四处林立，街道和码头上人满为患，景致与相隔半英里的比肯丘（Beacon Hill）有如天壤之别。  这个人口爆炸的小地方，为整个城市和它的居民带来了庞大的压力。尽管地方经济因而蓬勃发展，但是垃圾、污水、低工资等问题，威胁着当地居民的健康和生活福祉，为此，大家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学校的学生人数超额，教室里坐了各个种族的学生，大家都有各自的语言。波士顿城步履踉跄地设法收容这些居民；当地出生的贵族们认为，这些新移民必须学会英语、养成良好的工作习惯，他们得尽快“美国化”才行。许多公立学校都改以轮班的方式上课，每天开放十八个小时，除了提供各年龄层的孩童接受教育的机会，也提供课程给他们的父母。  终于，菲茨杰拉德一家人再也受不了这样拥挤的住宅与街道，搬离了罗斯的父亲约翰·菲茨杰拉德成长的地方。罗斯的母亲乔茜来自距离波士顿西边二十五英里外的农业小镇阿克顿（Acton）。两人结婚后搬到了波士顿北端，但是乔茜一直向往着空气新鲜，有着蓝天绿地的乡下地区。于是在一八九二年，罗斯两岁时，菲茨杰拉德如了妻子的愿，在距离阿克顿三英里的西康科德（West Concord）买了一座大房子。  就像许多爱尔兰邻居一样，为了更大的生活空间和更好的生活质量，他们离开了比他们穷困的邻居，还有残破不堪的木屋和老旧的砖屋。在一八九○年代晚期到一九二○年代，波士顿西端、布赖顿（Brighton）、洛克斯伯里（Roxbury）、多尔切斯特（Dorchester）和海德公园（Hyde Park），都经历了大规模的成长与发展，促进了这些地区与波士顿市区的整合。一八九七年，波士顿的高架铁路与地下铁完工，使得这些地区往来波士顿市区的交通更为便利，谋生也更为容易。  一八九五年，一心想在政坛闯出名堂的菲茨杰拉德进入了国会，从此得在西康科德和华盛顿两地之间奔波。乔茜过着悠闲的田园生活，加上离娘家近，又有好学校和大批仆佣，因此菲茨杰拉德虽然经常不在家，她的生活也不成问题。不过甜心菲茨始终忘不了波士顿城内人声鼎沸的气息，于是他决定投入一九○五年的波士顿市长选举，好将一家人搬回市区。将乔茜从她安逸的田园生活带回市区的条件，是多尔切斯特的维尔斯（Welles）大道上一栋华丽的豪宅，以及通往市区便利的交通。  甜心菲茨担任市长期间，波士顿的爱尔兰人已经成为一群团结的选民，连续几十年胜选，让他们不只在市政府，也在经济和社会机构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通过在各个小区组织与委员会中安排选区政客，爱尔兰移民有效整合了政治力量，形成了一部强大而稳健的政治机器。正是这种组织能力，让菲茨杰拉德在一九○五年十二月的市长选举中，获得压倒性的胜利，这一年，罗斯十五岁。不过，菲茨杰拉德和那些在爱尔兰出生的移民前辈，有很明显的差异：他是美国爱尔兰裔的天主教徒中，较年轻且思想较开明的一群，他们为贫穷、饥饿、失业和受压迫者发声。虽然菲茨杰拉德此前已经在不同的市立、州立，甚至国家级办公室服务过，但是当上波士顿市长这件事，在向来由清教徒居高位的波士顿中，仍是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当时他的竞争对手是乔的父亲帕特里克·肯尼迪（Patrick Kennedy），虽然肯尼迪败选，但是两人依旧维持友好，甚至是政治同盟。  事实上，甜心菲茨和帕特里克·肯尼迪家，长久以来在政治和社交上便有往来；打从罗斯和乔孩提时期起，两家人夏天就常一起在缅因州的旧奥查德海滩（Old Orchard Beach）度假。不过，一直到一九○六年夏天，罗斯从多尔切斯特中学（Dorchester High School）毕业，乔也即将在声望卓著的波士顿拉丁学校（Boston Latin School）开始最后一年的学习时，这两个年轻人才熟识起来。两人在旧奥查德海滩经朋友介绍而重新认识后，爱苗逐渐滋长。  当时的罗斯身价不凡，她以新任市长女儿的身份，踏进了波士顿的爱尔兰社交圈。  除了长得漂亮、头脑聪颖，落落大方的个性更让她成为波士顿爱尔兰裔里的明日之星。她修习外语、在新英格兰音乐学院（New England Conservatory）学钢琴、在波士顿市立图书馆当志愿者，也参与波士顿城内的德国和法国文化交流活动。镁光灯焦点下的她出尽了风头。  罗斯是父亲竞选路上的最佳拍档，还在高中时期，她就经常和父亲同台，代替母亲参加在波士顿举行的游行、午宴、晚宴和各种政治聚会。罗斯出生于一八九○年，她的出生填补了菲茨杰拉德内心的一大遗憾。菲茨杰拉德的一位哥哥和两个妹妹，都不幸在婴孩时期夭折，他的母亲也在一八八○年过世了。菲茨杰拉德在和来自阿克顿的乔茜·汉农结婚后，夫妻俩随即搬到菲茨杰拉德位于波士顿北端的家，和他还在世的其他九个兄弟同住。自从母亲过世后，这个家就没有其他女人住过。他很渴望有个女儿，而罗斯帮他达成了这个梦想。一位和菲茨杰拉德家有深交的友人，这么告诉历史学家多丽丝·卡恩斯·古德温（Doris Kearns Goodwin）：“他对女儿的爱……超乎他经历过的任何感受。”  身为长女的罗斯也完全没有让父亲失望，她既漂亮又聪明，是三个女儿中最受疼爱的。罗斯也以相同的爱回应父亲。“世界上绝对找不到任何人，可以和我的父亲相比拟，”她这么告诉古德温，“只要有他在的地方，就像被施了魔法一样。”罗斯像她父亲一样个性外向、反应灵敏，他们俩在政治和社交世界里是如鱼得水。罗斯的母亲不喜欢出风头，喜欢待在家里陪伴家人，她重隐私、宁可隐世而居，于是罗斯就成了母亲的最佳替身。  想当然，菲茨杰拉德对追求大女儿的人有很高的期待。罗斯在多年后写道：“我父亲认为我既漂亮又有气质、聪明又迷人。”随着她年纪渐长，“他对此更坚信不疑。我想，当父亲的人，没有哪个觉得有男人配得上自己的女儿。”罗斯最后下了这样的结论。“但是我父亲在这方面简直无可救药。”罗斯抱怨，父亲不让她参加任何学校舞会，也不准她和男孩子交际。她觉得父亲太过保守、对她保护过头了。只不过，年轻的乔和罗斯完全无视于甜心菲茨订的家规，两人早已认定了对方，经常瞒着父亲私会。  当时正值社会转向现代化的新世纪，罗斯早已下定决心，一定要参与日益蓬勃的女性自由运动。大批女性开始投入公共事务，不管在商业、零售业、医疗照护、法律、社会工作、教育、艺术等各行各业，都见得到她们的身影。女性受教育的机会逐渐普及，社交活动不再那么拘泥，政治上的权利也逐渐扩张了。虽然她们还没有投票权，但是可以通过妇女会、工会和渐进式的改革团体，对薪资、工作条件、市政、教育和公共卫生等相关立法进行游说。  上大学一直是罗斯的梦想，由于住在波士顿，所以这个梦想并非遥不可及。城里就有几所大学和学院，提供中产阶级和职业妇女职业和教育训练，这种机会可不是随处都有。十六岁的罗斯还没有到上大学的年纪，所以她决定，从多尔切斯特中学的高中课程毕业后，再留下来修一年预备课程，好为充满挑战的大学教育做更周全的准备。  在罗斯考虑要念大学时，提供女性高等教育的天主教机构还不多。虽然天主教设立学校行之有年，但是大多不提供大学学位，当时刚开始着手设立的私立天主教学院和大学，也都只招收男性。不过，位在波士顿地区的非教会学院、新教徒学院和卫理公会（Methodist）学院，像是西蒙斯大学（Simmons）、哈佛、维斯理学院（Wellesley）和波士顿大学（Boston University），都招收女学生，有些是直接招生，有些则是以附属学校的方式招生，像是哈佛的拉德克利夫学院（Radcliffe），就是将女同学安排在不同教室上课。  另外，天主教的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系统，也在这个时候逐渐具备雏形。当时天主教学生在公立学校遭受到歧视或霸凌的情况日益猖獗，当地的大主教约翰·威廉斯（John Williams）对此感到不满，便于一八八○年代起，着手筹备天主教的教区学校。波士顿婆罗门担心，天主教会这么大的动作，会动摇文明社会的根基，让他们珍视的清教徒价值荡然无存。新教教派一直是私立学校的主流，但是就连公立学校的课程内容，也受新英格兰扬基贵族和新教徒高层掌控超过两个世纪了。如果他们无法先掌控让谁来教这些爱尔兰裔的学生，就掌控不了爱尔兰裔的族群。  这个计划，主要是通过附属于教会的小学校开始展开，很快地，波士顿的天主教学校不断增加。尽管这些学校的质量参差不齐，但是有一群热忱的修女和非教派老师们，很认真地提出一些不输给其他新英格兰公私立学校的教学计划。到了一九○○年，在以移民者为大宗的市中心，公立学校已经容纳不了大量移民了，于是天主教学校便被视为“公立教育系统的安全阀”，可以帮忙接收一些学生。除了一般的学术课程，有些教区学校还提供职业训练课程，协助学生获得一技之长，可以尽快脱离贫困。  菲茨杰拉德市长虽然是天主教的公众人物，却深信公共教育的重要。他的弟弟亨利·菲茨杰拉德表示，菲茨杰拉德市长把罗斯和她的兄弟姐妹都送去协和公立学校（Concord public schools），因为他认为“想要在世界崭露头角，公立学校才是最好的训练基地”。  他的这项决定，明显违背了波士顿大主教区的期待。  在大主教威廉·奥康奈尔（William O Connell）的领导下，即使天主教学校的表现不如一般学校，教区内的天主教家庭，还是都把孩子送进了天主教学校。具有影响力的天主教神学家则希望，天主教可以更投入于教区学校。一九○六年，奥康奈尔大主教的同僚明尼苏达州的爱尔兰大主教就说：“学校的世俗化，使我们处于一个危险的世代、危险的美国。”他大声疾呼，做父母的，“应该竭尽所能，提供孩子完善的天主教教育。这是完全不能妥协的……唯有日复一日拿信仰教导我们的孩子……才能让信仰扎根在他们身上，叫他们到老也不偏离。”他也警告，若不这么做，“将有大批的孩子失去信仰”。到了一九一○年，有将近百分之十五的马萨诸塞州学生，就读天主教教区学校。  天主教教会的保守作为和分裂主张，不但让非天主教徒更加不信任他们，也更加害怕。大家怕教育将来可能会由天主教全权掌控，再加上东欧和南欧的移民也在这时纷纷来到美国，他们不讲英语、奇装异服，宗教习俗不同、吃的东西也稀奇古怪，因此当地居民兴起了一股本土主义，反天主教的情结更是有史以来最甚的。  不管怎样，菲茨杰拉德举家搬到多尔切斯特后，他们可以选择波士顿里的任何一所天主教学校就读，但是他偏偏把孩子全送进公立学校。身为市长，竟完全无视教会的指示，他这样做，无疑是同意支持拓展公立学校系统，以应付人数渐增的移民者孩童和他们的父母。  罗斯在多尔切斯特高中修预备课程时，就已经向维斯理学院申请了入学许可。这所学院位于卫本湖（Lake Waban）湖畔，距离波士顿城大约二十英里。它是在一八七○年创立的，算是美国相当古老的学院，提供严谨的人文学科课程，而且只招收女生。  在该校授课的都是当时极享盛名的大师级人物，该校的毕业生更不乏在社会、科学、政治、文学和经济等领域的领袖。罗斯迫不及待想在知识上有更高一层的追求，所以当她得知自己和三个好朋友露丝·埃文斯（Ruth Evans）、薇拉·莱格（Vera Legg）、玛格丽特·欧卡拉汉（Marguerite O Callaghan）全都申请上维斯理时，真是欣喜若狂。 | | |
| **作者后记**  后记  我还清楚记得二〇〇五年的一月初，我在《波士顿环球报》看到了罗斯玛丽的讣告。我知道罗斯玛丽是谁，但是我很惊讶她竟然默默地活了这么久。另外，我也对于讣告内容那么扼要感到震惊不已，直觉告诉我，她背后应该有很多故事的。她后来怎么了呢？为什么我们知道的这么少？都已经是二十一世纪了，家里的人如果有智能障碍或精神疾病，应该不再是不可告人的秘密了吧？我很快就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一直等到二〇〇八年，我完成了另一本书之后，才有机会着手搜寻罗斯玛丽的资料。很幸运的，我住在波士顿附近，到肯尼迪图书馆及博物馆非常方便，罗斯和乔·肯尼迪的私人文件都保存在这儿。罗斯·肯尼迪的日记和剪贴簿，一直到那时才对外公开，所以我算是较早看到这些私密文件的人。  但是开始不到一年，我的工作就遇到阻挠了。我十九岁的儿子被诊断出罹患了思觉失调，也就是俗称的精神分裂症。我们立刻面临各种困难。首先，是帮他找到一个安全，同时又可以接受治疗的环境，期待他能早日“痊愈”。我们有的选择不多，而且花费都十分昂贵。最后，我们送他去有人极力推荐的寄宿型治疗计划，希望如大家说的，他的状况会很快改善。相隔两地，我们想念他，他也想念我们。痛苦之余，我们也发现，精神疾病的污名依旧存在。一些亲朋好友和我们谈到这件事时，都支支吾吾的，甚至有人把孩子生病怪到我们头上。我们觉得很不舒服，也很无奈。  在医生的治疗和看护细心的照顾下，我儿子的病情稳定了，于是，我重拾罗斯玛丽的工作。但是这一次，我在看罗斯玛丽的经历和她家人的反应时，有了不同的眼光，体会也更深刻。  过去六十年来，谈论肯尼迪家族或是家族个别成员的著作很多，它们都是我在写这本书时的重要参考，我也在书后的批注将引用到的部分，一一列了出来。但放眼望去，过去罗斯玛丽在大家的心中，一直是边缘人物，与她德高望重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们相较起来，微不足道。早期的传记作家多是从报纸杂志的报道，或是肯尼迪家成员告诉他们的事情，得知罗斯玛丽的事，但不管是哪一个渠道，得到的消息通常是经过严格控制的。一九八〇年代，多丽丝·卡恩斯·古德温在撰写《菲茨杰拉德和肯尼迪们》（*The Fitzgeralds and the Kennedys*）时，史无前例地获准参阅肯尼迪基金会保管的约瑟夫·肯尼迪个人信件。古德温访问了几十名肯尼迪家族的成员、生意上的伙伴和朋友等，掌握了许多关于肯尼迪的新资料。她对罗斯玛丽的了解是当时最彻底的，第一个揭发罗斯玛丽接受过额叶切断术的正是古德温。但是在她的书中，罗斯玛丽也仅是家庭众多成员中的一员，并没有多谈。我确信可以从肯尼迪图书馆最新公开的罗斯·肯尼迪遗物中找到更多讯息。  古德温的著作发表后，许多传记作家也在他们的书中提了罗斯玛丽的事，但依旧只是蜻蜓点水，把她当成肯尼迪家的次要人物看待，谈的大概也就只是古德温当时的发现而已。但我认为，罗斯玛丽其实是这个活跃家庭里的灵魂人物，我若是以她为主角去写，将能重新诠释肯尼迪家中女性的角色，也探讨她对整个家族的影响。  一九九〇年代，肯尼迪基金会将约瑟夫·肯尼迪留下的文件，赠送给波士顿的约翰·肯尼迪图书馆，但是严格限制借调这些文件。过去二十年来，部分机密文件的内容才慢慢公开，让传记作家们有些新数据可以参考。但是大部分内容还是不公开的，现在有了罗斯遗留的文件，就可以互相弥补了。两相对照下，我得以更深入推敲到罗斯和乔，还有其他孩子们当时的想法和作为。虽然罗斯玛丽本人的相关文件非常有限，但是我很幸运，看到了她写的所有信件，其中有几封甚至是首度公开，这也是先前的肯尼迪传记作家没有的信息。  除此之外，罗斯玛丽的老师或看护写的一些信，也是首度公之于世，从这些信件可以得知，罗斯玛丽曾经经历什么教育和治疗安排。其中，又以英国圣母升天学校的尤金妮·伊莎贝尔修女成功的案例，最令我感兴趣。我因此研究了玛丽亚·蒙特梭利医生的教学方式，还去了马萨诸塞州的伍斯特（Worcester），拜访圣母升天会的修女。她们跟我分享了伊莎贝尔修女的个人档案——她是蒙特梭利医生的嫡传弟子，具有教书和担任精神导师的天分，至今不管在美国或其他地方的蒙特梭利教室，都还可以感受到她的影响。  我比对手上的数据和当时的社会环境，见到那时由于社会普遍无法接受智能障碍者，肯尼迪家陷入一团混乱，现实逼得罗斯和乔不得不想尽办法“治愈”罗斯玛丽的障碍问题。但是他们面对的，是尚未健全的医疗系统，以及冷漠的社会态度。我们可以从某些心理医生、老师、小儿科医生的回信，充分感受到肯尼迪家几十年来遭遇的挫折、绝望和无情的拒绝。不过同样，我也在罗斯和乔与家庭教师、某些老师、医生，甚至生意上的伙伴、律师和天主教神父、修女等，往返的书信里看到，大家无时无刻不关怀着罗斯玛丽。将这些数据一一串起后，我完成了这幅罗斯玛丽悲剧的拼图。  除了信件，这些文件还包括了肯尼迪家的收据，里头有罗斯玛丽的学费、住宿费、医疗收据和社交生活的花费收据。只不过当中有许多和罗斯玛丽有关的资料，都被放了一张盖着“撤回”的粉红色纸张，表示一般大众和研究人员都不能借阅这些文件。  在罗斯玛丽的档案中，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七〇年代间，有数百份文件被撤回。这些资料中，有许多是和她接受额叶切断术，以及事后的治疗有关的，但是由于受到《医疗保险流通与责任法》保护，她接受额叶切断术的医疗记录，将永不见天日。这项法案是一九九六年通过的，罗斯玛丽的弟弟爱德华·肯尼迪，也是支持这项法案的其中一个参议员。有了这项法案保护，再加上罗斯玛丽自己也无法叙述当时的经过，一九四一年十一月这天，在乔治·华盛顿医学院发生的事，将成为永远的秘密。  我回头看当时的医学期刊、科学研究和知名文章后发现，当时的医学专家不管在想法或决定治疗方式上，都经常被自己的偏见误导。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医治智能障碍或精神病患的方式，都缺乏医学和教育基础。读了弗里曼和瓦特在罗斯玛丽接受额叶切断术的几个月后发表的研究，包括几个详细描述的案例，更让人对她悲惨的遭遇感到心寒。  另外，我很幸运地拿到了一封某个马萨诸塞州营队负责人的私人信件。一九四〇年，罗斯玛丽曾经在她的营队待了一个月，我访问了这位负责人的女儿泰瑞·玛洛塔（Terry Marotta）。尤妮斯·施赖弗的两个儿子安东尼和蒂莫西，也接受了我的访问，提及他们对罗斯玛丽的印象，还有她经常到家里做客的事。就像其他同辈分的肯尼迪成员一样，他们对罗斯玛丽的早期生活、智能障碍，以及接受额叶切断术的事，也了解得不多。  由于我自己的孩子有身心障碍，我对罗斯玛丽和她的兄弟姐妹，特别是她的妹妹尤妮斯，充满了感激——她的付出给了我们力量，让我们可以站在精神疾病患者和智能障碍者的立场，继续争取更多对话和行动。 | | |
| **多角度上市图** | | |